

QINGNIANXUEZHE



李长莉 著

CONGSHU

先觉者的悲剧

青年学者丛书

92382



200216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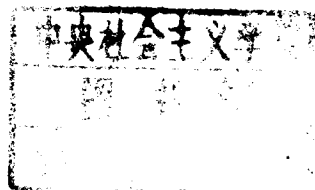
青年学者丛书

先觉者的悲剧

——洋务知识分子研究



学林出版社·李长莉 著



(沪)新登字 113 号

特约编辑：赵人俊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沈蓉男

先觉者的悲剧

——洋务知识分子研究

李长莉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70,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10-761-0/K · 49

定价：6.75元



作者简介

李长莉，1958年2月生，原籍河北束鹿。198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合著)、《民族与文化》(合著)、《清代全史》第七卷(合著)、《中国现代化史》(合著)及论文《晚清同文三馆对人才的培养》、《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等多篇。现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0069/E3

有位未来学者声称，今天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人类社会已从“年轻人向长者学习”的“后喻”文化，转变为“成年人和儿童主要都向同龄人学习”的“同喻”文化；下一阶段将是“长者向年轻人学习”的“前喻”文化。

事实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总是互相学习的。如果把这位未来学者的说法绝对化，不免失之偏颇；但他指出年轻人越来越走在前头的趋势，则是很有见地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就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形势，为这批新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当前，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同时推动着人类知识系统的高度互渗，新领域、新学科、新课题不断地被开拓。面对这新情况，年

出版前言

CHUBAN
QIANYAN

长者和青年人必然地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青年人拥有思维结构灵活的优势，因此，可能思想更解放，更勇于探索，他们的研究也就可能更富有生命力，更富于创造性。

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为此，我社决定出版“青年学者丛书”。

出版“青年学者丛书”是个新的尝试。我们渴望这套丛书能获得青年学者们的支持，向我们出示你们的最新、最佳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期待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给予热忱的关怀和帮助。毫无疑问，任何新的成果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都有赖于前辈的扶持。

我们和青年学者一起瞻望着中国学术的未来。

学林出版社

引 言

中国近代历史，既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作为文化主要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文化冲突的焦点和社会政治变动的漩涡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求文化更新和社会进步的不懈奋斗中，为中国近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困惑：为什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充满了艰难、痛苦和曲折？为什么他们形成了一些充满矛盾的特殊性格？如强烈的政治意识与逃避政治的倾向共存，激进与保守并立，执著的奋斗精神与软弱、摇摆性夹杂，对新文化的追求与对旧传统的依恋相互交织……。这些历史的谜团，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不已。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只有通过考察中西文化冲突的特定格局和社会变动的特定条件，分析知识分子生存、发展的状况，才能予以理解。特别是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初期状况进行考察，尤为我们认识后代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渊源所在。

十九世纪中期，当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被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候，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汇和中国社会的变动，中国知识阶层也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化。在中国最初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洋务运动中，出现了第一个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洋务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新文化因素的代表，在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中，在强大的传统社会势力的压力下，面对着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为求得自身及新文化因素的生存和发展，洋务知识分子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着艰难的开拓，寻求使自身所代表的新因素获得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代表近代化方向的新文化和社会因素开辟着发展道路，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特定性格和行为方式，走过了一段步履蹒跚、充满坎坷的历程。回顾他们的历史，剖析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对于我们理解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性及发展进程将会有所启示。

目 录
MU LU

引言……………(1)

第一章 洋务知识分子:
中西文化交汇和
社会变动的产儿
……………(1)

一、西学东渐与士林的
变动……………(1)

1.西学东来……………(1)

2.士林的变动……………(7)

3.教会学校的“洋学生”
……………(12)

4.寻求社会价值……………(15)

二、洋务运动与洋务人
才……………(20)

1.洋务运动的兴起……………(20)

2.对新人才的需求与招用
……………(23)

3.招集新人才的渠道……………(29)

三、洋务教育与洋务学

生……………(33)

1.洋务学堂的学生 ……(33)

2.官派留学的学生 ……(39)

3.洋务学生的派用 ……(41)

第二章 社会新角色…………(48)

一、新知和旧学…………(48)

1.西方科技知识 ……(48)

2.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52)

3.传统国学知识 ……(56)

二、专业化的职业

……………(59)

1.工交企业技术人员 ……(59)

2.军事技术人员 ……(61)

3.洋务外交人员 ……(63)

4.文化教育人员 ……(64)

第三章 思想观念的更新

与矛盾……………(70)

一、“尚富强”的新价值

观……………(70)

1.面向新世界……………(70)

2.寻求西方富强之术 ……(76)

二、社会改革思想…………(84)

1.变法与学西方 ……(84)

2.发展工商,以富求强
……………(87)

3.提倡改革教育 ……(90)

4.改革政治制度思想 ……(95)

三、两种价值观的对峙

与调和……………(97)

1.传统价值观的羁绊 ……(97)

2.“中体西用”模式的
内在矛盾 ……(108)

第四章 外部的社会困境

……………(118)

一、洋务官僚的束缚

.....	(119)
1.对洋务官僚的依附	
.....	(119)
2.洋务官僚的疑忌与	
控制	(124)
二、传统士人的排斥	
.....	(131)

第五章 文化心态与矛盾

人格	(141)
一、寻求社会价值的心	
理与压抑心态 ..	(141)
1.对实现社会价值的追求	
.....	(141)
2.挫折与压抑心理 ..	(147)
二、角色转换与认同	
心理	(151)
1.学与仕的分离	(151)
2.寻求社会角色的认同	

.....	(153)
三、学习西方与寻求	
对抗	(156)
1.民族意识与爱国感情	
.....	(156)
2.寻求文化对抗的心理	
.....	(162)

第六章 困境中的开拓者

.....	(168)
一、对新事业的艰难	
开拓	(168)
1.倡议兴办洋务事业	
.....	(168)
2.洋务事业的基本技术	
力量	(172)
二、对西方文化的有限	
引进	(181)
1.引进、介绍西方科技	
文化的活动	(181)

2. 译著西学书籍内容的 局限	(186)	2. 对维新运动的影响	(196)
3. 引进、介绍西学活动 的作用和影响	(189)	结语	(207)
三、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194)	附录	(211)
1. 改良思想的影响 ...	(194)	后记	(230)

第一章

洋务知识分子：中西文化交汇和社会变动的产儿

知识阶层的变动，总是同文化和社会的变动相联系的。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出现明显的近代化变动趋向，是在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而发生的社会变动中，以西学东渐，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为契机的。

一、西学东渐与士林的变动

1. 西学东来

西学的东来，在明末清初曾有过一次小小的热潮。自明万历初年，即十六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欧洲商船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之后，欧洲各国的传教士纷纷渡海东来。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先后来华的传教士达一、二百人。他们在中国各地积极活动，宣讲教义，发展教徒，结交中国官员和士大夫。他们还陆续从欧洲带来上万部宗教、科学等方面的书籍，翻译、编写和刊印了数以千计的汉文西学书，向中国的士大夫散发，力求

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1]

然而，这次看来颇具规模的西学输入，并没有对中国社会造成多少影响。当时，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还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大突破，因此，还没有显示出其巨大威力。而这一时期的西学输入，只是凭借传教士这一狭窄的宗教文化桥梁，也大大削弱了它的冲击力。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面前，这种以宗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显然并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力量。西方强调灵与肉的冲突和人生的苦难，企求上帝拯救灵魂的宗教哲学观念，与肯定现世人生，注重现实，追求社会和人地和谐、人生安适的中国传统儒家观念大相径庭。因此，西方的宗教并不能引起中国士人精神上的共鸣和理解，没有什么吸引力，甚至被等同于一般民间的世俗迷信而受到鄙视。虽然同时引进的一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吸引了一些士人的兴趣，但是也被视为类同于中国传统的“实学”、“技艺”等“偏门杂学”。在中国士人眼里，这些“杂学”，除了可以满足“格物致知”的乐趣和偶尔的特殊应用之外，并不具有什么新的意义。在这种中西文化格局之下，尽管当时的传教士们曾积极地进行文化输入活动，但他们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知识阶层并未造成广泛的或带根本性的触动。

此外，这时期在中国沿海主要进行商业活动的西方势力，也没有对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构成威胁。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封闭性状态，它所面对的问题仍然是那些传统的老问题：土地不均，官吏腐败，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也自有一套传统的方法来对付，并不需要向外来文化寻求新的东西。因此，对于西来之学，除了其精密的天文算学可以被用来增进皇帝颁行历法的准确性，以及朝廷为了应付零星海盗和叛乱偶尔请传教士帮助铸造少量火炮之

外，^[2]其他的西学知识，对于治国经邦来说，似乎一无用处。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是自足的，无假外求的。正因为如此，到康熙中期以后，由于罗马教廷宣布禁止中国教徒祭拜祖宗和孔子，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大义和纲常礼教，这样一来，“西学”不仅仅被认为是无用的，而且变成了扰乱民心、有可能引起混乱的有害之物，康熙帝便毫不犹豫地宣布“禁教”，以后又屡次禁教，乾隆帝并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实行闭关政策，彻底断绝了传教士的往来和西学的输入。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于被认为有害于社会而最终被中国摒弃于国门之外。

西方文化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输入，但是由于它并没有得到士人的文化认可，社会也没有对它产生实际的需要，所以，它并没有能在中国社会中立足、扎根。在文化层面，除了零星的科学知识被汇入中国的实学杂流之外，其他的影响则几无痕迹。中国的知识阶层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士人仍然是传统的士人，他们依旧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方式生活着，中国的社会也并没有因为西学的东来而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然而，就在西学连同西教被逐出中国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方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8世纪后半叶起，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先导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并很快席卷欧洲大陆。大机器生产以其惊人的魔力，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生产力和巨大财富，同时也激发了欧洲人征服世界，攫取和占有更多财富的欲望。从十八世纪后期起，以英国商人为先导的西方人，开始积极谋求开拓中国市场。在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之后，1840年欧洲人终于以鸦片和坚船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不得不再次与西方人直接打交道。

这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不再仅仅是手拿西书、对孔子表示尊敬、屈就听命于中国皇帝的儒雅谦恭的传教士了，而是以坚

船利炮和机器产品开路，强行闯入中国攫取财富和种种利权的强横的西方人。他们包括野心勃勃、充满发财欲望的商人和冒险家、传教士，以及以保护这些人利益为责任的军队和外交官。这次随西方人而来的，也不再只是基督教文化，而是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诸种势力。在这股汹涌而来的西方势力面前，中国这个自成天下的古老文明帝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了更发达文明的强有力的挑战。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威胁和新问题。这种形势使中西文化的再次接触出现新的态势。

这时的中国知识阶层的状况如何呢？自清中叶以来，士林呈现出一派昏暗、涣漫景象：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以来实行尊崇正统、钳制异端的文化政策，士人们在专以八股帖括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心智受抑，才华被泯。在学术领域，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和受统治者提倡的考据学并立为两大学派，文人学士或沉溺于空谈性理，或埋头于考证训诂，不问政治，不闻现实，思想保守，学风沉闷。

然而，自嘉庆以后，士林中开始发生变化。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叶开始，社会弊端逐渐显露：下层人民生计困难，吏治腐败，军备松弛，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加剧，人民起事频仍，清朝统治危象毕现，社会出现种种衰败迹象。这种现实促使一些思想敏锐而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人从玄学思辩和音韵考据中惊醒过来，他们基于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重新提倡“经世致用”精神，谋求矫治社会弊病的办法，为现实的危机寻找出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包世臣、张际亮等人为代表的“经世”派学者，他们抛弃了空疏的理学和繁琐的考据，转而研求有利于治国经邦的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舆地、边疆、战守等“实学”。在他

们的影响之下，士林中兴起了一股讲求“经世致用”、研求“实学”、要求变革的新思潮和新学风。

“经世致用”是正统儒学的一种传统理论，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学，它与注重修身养性的“内圣”之学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随着社会和政治需要的变化而此兴彼衰、或彰或隐。当社会出现弊病和危机的时候，经世思潮就会崛起，谋求振作和改革。这种观念的集中指向，就是立足现实，注重实效，它贯穿着高度的社会现实感和实用精神。千百年来，每逢衰世或乱世，总会有仁人志士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起而力挽狂澜或重创基业。嘉庆以后经世派士人，就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起而研求经世致用之学，力求矫正理学和朴学空疏、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以拯救社会于既颓之势。他们或发表政论，撰写时文，抨击朝政；或研求治国实政，潜心实学。初期，他们所面对的仍然是传统的老社会问题，因而他们谋求改革的方法和内容也基本上传统式的。随着西方威胁的加重，直至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西方侵略的威胁。正是这些经世派士人，以现实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首先对西方的威胁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将“经世致用”的视野扩大到了“制夷”这一新的时代问题。他们从抵抗侵略的角度出发，开始了解这个对手。经世致用的观念，使他们具有较为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眼光，乐于了解和接受新知识。就是这部分重振“经世致用”精神的开明士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虽然自十九世纪初开始，西方势力及文化影响就已在中國周边和东南沿海渗透，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刊印的报刊、书籍也有所流传，但并未在士人中引起多少注意。直至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士人为了了解这个前所未知或知之甚少的对手，才开始对西学西书给予关注。他们广为搜求有关西方的书籍，竟